

工具理性、社会认同与群体愤怒 ——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陈 浩 薛 婷 乐国安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 集体行动现象一直备受社会科学共同体关注。20 世纪早期, 社会心理学曾是集体行动研究界的主导视角, 后逐渐转至社会学与政治学视角。最近 20 多年, 社会心理学视角开始复苏, 进入研究复兴期。社会心理学家先后确认工具理性、社会认同和群体愤怒这三种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前因变量, 并分别建构了包含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路径、包含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路径, 以及包含社会认同、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路径的三种重要集体行动参与模型。未来的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应重视行动情境类型、个体心理特征和除愤怒之外的群体情绪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作用, 考察理想信念等潜在新前因变量的可能地位, 加强与群际关系、歧视动机等其它经典研究领域的联系。

关键词 集体行动; 工具理性; 社会认同; 群体愤怒; 群体情绪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现象一直备受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关注, 其学术渊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法国社会心理学家 Le Bon (1896)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crowd)非理性心理的系统阐述。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社会学家 Park 和 Burgess (1921)首先使用“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一词标定群体类现象, 后经 Blumer (1951), Turner 和 Killian (1957), Smelser 之手(1963), 集群行为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20 世纪上半叶, 集群行为研究在保留社会心理学内核的同时, 不断向社会学视角转变, 但非理性情绪一直是集群行为研究的中心议题(赵鼎新, 2006a)。

1965 年, 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Olson 提出集体行动理论, 带来著名的公共物品供给困境“搭便车问题”(Olson, 1965; 赵鼎新, 2006b), 引

起学界巨大反响, 由此集体行动一词进入社会科学界视野。集群行为和集体行动两概念彼此关联但又区别明显。集群行为多描述非理性、表达性的群体行为(王赐江, 2010; 周晓虹, 1994); 集群行为诸多研究关注行为对社会控制组织的破坏和瓦解, 多从威权者视角出发。而集体行动强调理性努力, 多描述具有明确捍卫、提升集体利益意向的群体行为; 集体行动研究关注动员、组织、机遇和威胁, 多从挑战者视角出发(Miller, 2000)。Olson 提出集体行动理论之后, 各学科纷纷开始借鉴集体行动是参与者充分权衡、组织动员结果的理性主义观点, 研究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的群体类现象(董国礼, 2007; 林闽钢, 2004; 刘能, 2009)。集体行动一词逐渐替代集群行为成为此类研究的合法术语, 社会心理学视角自此明显式微。

理性主义视角下发展出的资源动员(McCarthy & Zald, 1977)、政治过程(McAdam, 1982; Tilly, 1978)等社会学、政治学集体行动理论, 进一步认定集体行动是社会资源或政治机会有效利用的产物, 将其还原成一种结构化的理性过程(王国勤, 2007), 完全忽略情绪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上世纪末, 集体行动研究界开始意识到这场决然的理

收稿日期: 2011-05-26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B10146)。

通讯作者: 乐国安, E-mail: yuega@126.com

性转向是“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如今理性主义趋势已得到适当拨正,情绪重新回到集体行动学者的研究议程之中(Goodwin, Jasper, & Polletta, 2001; Jasper, 1997, 2011)。

与此相对应,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动研究又开始兴起。最近20多年,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以荷兰社会心理学家 Klandermans 为代表的欧洲研究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立足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早期以“社会运动”为概念术语)的过程机制(Klandermans, 1984; Klandermans & Oegema, 1987)。稍后以加拿大心理学家 Wright 为代表的北美心理学者,也开始研究他们称之为“集体行动”的群体行为现象,并对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动概念进行明确定义(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后被众多研究者认同和引用,以至于欧洲学者也开始采用集体行动这一术语。这段持续至今的复兴期,可称为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当代阶段。本文以下篇章介绍的内容如无特别说明,皆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它们主要关注何种原因促使个体参与集体行动。

2 集体行动的定义与测量

定义规范概念的边界条件。研究者们如果未能对集体行动概念的边界条件形成一致看法,就不能就现象本质达成一致性观点,明晰促发集体行动的前因变量也就无从谈起。

2.1 集体行动的定义和内涵

虽然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当代研究已逾20余年,但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很少自己在研究中给出明确定义,多是约定俗成地直接引用 Wright 等人(1990)给出的定义:“如果某人像所属群体典型成员那样去行动,且其行动旨在改善所属群体状况,那么他/她即是投入到了集体行动中。”根据该定义,集体行动属于群际行为,是一种旨在提升所属群体地位的行动策略,它与旨在提升个人地位的人际行为不同。

该定义提出20年后, Wright (2009)进一步明晰并适当发展了概念内涵。第一、是否为集体行动不取决于参与者数量。即使是物理空间上彼此分离的个体,也有途径和方式参与代表其所属群体的集体行动。第二、集体行动是集体性而非个体性联合行动。那些完全受个人利益驱动

行动不能被认为是集体行动。第三、个体参与旨在提高外群体地位的行动也属集体行动范畴。

现实中常有一些优势群体(advantaged group)成员会行动起来支持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或其成员,但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且行动反而有可能危害到所属优势群体的地位或利益,很明显此类行动不符合之前经典的集体行动定义。但 McGarty, Bliuc, Thomas 和 Bongiorno (2009)提出的观点群体(opinion-based group)概念可解决这一问题。譬如,持种族平等观点的群体中既有少数族裔人,也会有白人;女权主义群体中也有男性支持者。这时,优势群体成员不再是代表外群体,而是代表新形成的观点内群体去行动。

2.2 集体行动的操作化测量

大多数集体行动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Klandermans, 1984)、实验法(Ellemers & Barreto, 2009),也有研究使用质性方法,比如访谈(Van Aelst & Walgrave, 2001)、观察或直接参与(Drury & Reicher, 2005),还有一些研究会分析有关集体活动的媒体报道(Koopmans & Statham, 1999),或运动组织出版物等。各类研究以不同方式对集体行动概念进行操作化,其中包括行动态度、意图、倾向、实际行动或参与历史报告。

集体行动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预测实际行动的发生,但实际行动只反映集体行动心理动力过程的一个阶段。Van Zomeren 和 Iyer (2009)认为,研究和测量实际行动之前的几步,可获得更多有关参与过程机制的认识。Klandermans 和 Oegema (1987)早期提出的社会运动参与“四步模型”可作为探讨参与过程机制的有效参考框架。他们认为通往社会运动参与之路的第一步是:人们由于同情某项运动的政治或策略性目标,而成为该运动的潜在动员目标,但这时还只是态度支持;第二步:人们正式成为该运动的动员目标;第三步:人们产生了参与运动的动机;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人们冲破重重障碍(比如时间、金钱、可能坐牢的危险,或承担其它责任)参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概念的不同操作化测量方式可与该模型中不同的步骤相对应:观察、采访抗议示威现场参与者的研究对应于模型第四步(Drury & Reicher, 2005, 2009);问卷调查集体行动组织成员行为意图的研究对应于模型第三步(Simon et al.,

1998);采用实验方法设置情境,考察弱势群体成员对于集体行动的态度研究(Wright et al., 1990),可对应于模型第一步,甚至是更早步骤的心理过程。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反映不同阶段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集体行动背后的多重信息。

3 集体行动的三种主要社会心理学解释取向

过去20多年间,社会心理学家不断观察、研究参与到抗议示威等集体行动中的个体,逐渐发现一些动机变量,正是这些变量激发着个体投身到集体行动中。他们最初关注个体对行动成本和收益的主观感知,它以工具理性(instrumentality)为特征(Klandermans, 1984),参与集体行动被看作是一次以可承受成本改变群体现状的机会。而后,他们开始重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重要性(Simon et al., 1998)。后来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解释取向开始兴起,尤其是群体愤怒情绪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作用(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

3.1 工具理性

如前所述,整个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转而重视社会政治结构性客观因素的作用,资源动员理论(McCarthy & Zald, 1977)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它强调社会资源的可利用性、行动潜在参与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但资源动员理论过于结构化,甚少关注个体对参与成本和收益的主观权衡,完全抛弃社会心理的分析水平,较少关注个体间互动而形成的动员。

针对资源动员理论的缺陷,Klandermans (1984)将集体行动理论思想和期望价值理论引入其中,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的社会心理扩展模型”。该模型采用期望价值理论中的“期望×价值=行动动机”公式(Feather & Newton, 1982),量化集体行动参与动机的强度;并依据集体行动理论的思想,将集体行动的参与动机划分为三种:

(1)集体性动机(collective motive),它是行动的集体目标。该动机是个体对集体目标实现的主观期望和主观价值的乘积,集体性动机的主观期望成分以3项彼此关联的项目构成:“如果自身参与该行动,估计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该行动的成功”;“如果很多人参与,预期该行动成功的可能

性有多大”;“预期会有多少人参与该行动”。集体性动机的期望成分,尤其后两项被认为是关于所属群体能否通过一致行动解决问题的信念分享(Mummen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或是一种能否改变群体相关问题的控制、影响、力量和效力感(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被称为群体效能(感)(group efficacy)。在许多工具理性取向的集群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为求简便,常常使用群体效能替代工具理性。(2)社会性动机(social motive),是参与者对重要他人反应的期望。它以期望他人反应的性质(正向赞同或负向反对)和他人重要性的乘积来表达。(3)奖赏动机(reward motive),它与社会性动机同属集体行动理论中的选择性激励,但奖赏动机是更加个人化的成本和收益,譬如参与集体行动需要耗费个人时间、精力、自付差旅费,但能与同好们共度美好时光等。这一动机也以期望与价值的乘积来表达。

Klandermans等人(1984, 1987)将心理学视角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中,揭示了个体水平上的决策心理,确认个体间互动可作为恰当的分析水平,延长了资源动员理论的生命力。但是,社会心理学家们质疑集体行动参与能否被工具理性充分解释(Kelly & Breinlinger, 1996; Klandermans, 2003, 2004)。Kelly和Breinlinger(1996)就指出,针对旷日持久型的集体行动,工具理性解释乏力:参与罢工抗议的工会成员,常常背负极端艰难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并且他们很清楚即使行动成功,获得的收益也会很少,但他们仍然坚持行动下去。

3.2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 Turner, Hogg, Oakes, Reicher, & Wetherell, 1987)的核心假设是人们会为正向自我评价而努力。这一自我评价包括两种成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人认同以个人属性定义自我;社会认同以所属社会类别身份、群体成员资格定义自我。社会认同可看作是一种认知机制,是从“我”到“我们”的自我认知再定义。当群体成员们都以群体身份定义自我时,他们会专注于自己与其他成员间在经历、需求、兴趣或目标上的相似之处,我的和你的经验、需求等通通转化为我们的经验和需求,这是迈向集体行动的重要一步(Simon & Klandermans, 2001)。社会心理学家在对工人或妇女(Kelly & Breinlinger, 1996; Kelly, C. & Kelly, J., 1994)、老

年人或同性恋(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农民(De Weerd & Klandermans, 1999)、前东德人(Mummendey et al., 1999)或胖子身份(Stürmer, Simon, Loewy, & Jörger, 2003)的社会认同和集体行动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对某一社会类别、群体的认同感越强,就越有可能代表那一社会类别、群体参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常常需要个体对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一般而言,人们不会对所处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但是当以下三种社会结构条件满足时,个体不仅会向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而且很可能代表群体参与集体行动:(1)群体间边界的可渗透性,即个体对自身获得优势地位群体成员身份可能性的感知。当个体认为有可能时,他们将不再对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当个体认为没有可能时,就会对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2)稳定性,即群体间相对社会地位的稳定性或可变性。认为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可变的个体,会将集体行动看作是改变所属群体社会地位的策略之一,它促使人们代表群体参与集体行动。(3)当个体认为其所属群体的劣势处境不合理或不公平时,集体行动参与意向将会加强。简言之,对弱势地位群体付出高承诺的人(高认同者),在相信集体行动能改变群体弱势地位状况且认为该状况不合理时,将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Van Zomeren & Spears, 2009)。

高认同成员间的共同愤怒意识进一步加强,明确了该为所属群体弱势处境负主要责任的外群体,行动动员话语直指这一敌对群体,行动方开始有意识寻求赢得政府等权威机构或大众等第三方的关注和支持,此时,社会认同将发展出它的高级形式——政治化社会认同(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Simon & Klandermans, 2001)。

3.3 群体愤怒

一些关注客观结构性变量的传统观点认为客观资源剥夺、分配不平等是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之一。但客观资源剥夺论不能有效解释为何一些弱势地位群体成员会产生不满情绪,集体行动起来,而另一些却安之若素、情绪稳定。Stouffer, Suchman, DeVinney, Star 和 Williams (1949)提出相对剥夺概念,首先解释了客观剥夺为何不能充分预测人们的不满,由此揭开了相对剥夺理论发展的序幕。该理论关注不公造成的不平等体验,

认为相对剥夺感是在与特定他人比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只有体验到不公时,社会比较才有可能导致不满情绪。

但直接将相对剥夺感当作是集体行动的主要前因变量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相对剥夺理论最初针对个体层面提出,研究表明个人水平上的相对剥夺感并不能有效预测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Runciman (1966)在相对剥夺理论中引入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两概念。群体基础上的剥夺体验才有可能导致集体行动,个体剥夺感只与个体行动相关(Smith & Ortiz, 2002)。其次,即使出现不满甚或是极度负向的情绪,也不能预测个体将采取的行动方式,群体相对剥夺感也并不必然引发集体行动(Tajfel, 1982)。

新近出现的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接过相对剥夺理论的接力棒,向前发展(Seger, Smith, Kinias, & Mackie, 2009; Smith, 1993; Smith, Seger, & Mackie, 2007)。群际情绪理论与情绪评价理论一脉相承,情绪评价理论认为评价、情绪和行动是人们感知和处理社会事件的几种方式。Smith 等人(Smith, 1993; Yzerbyt, Dumon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将情绪评价理论推至群体水平:群体成员会将不公平感评估为集体事件,而非个体事件。群体成员感知到群际不平等或不公平剥夺,并对该为此现状负责的对象(多数为另一群体)的责任、意图、实力、行为可预测性进行综合评价,继而产生相应的群体情绪,譬如愤怒、恐惧、焦虑等。群体情绪具有明确的对象指向性,其中像愤怒这样的情绪才会激发集体行动,旨在消除或减小不公造成的被剥夺感。换言之,群体愤怒情绪(group-based anger)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与早期 Le Bon 关于集群行为中的情绪是个体失调反应的观点不同,这种现代群体情绪观点认为,群体情绪是个体对所属群体相关情境或事件的功能性反应。

4 集体行动参与模型建构

随着发现的集体行动前因变量越来越多,研究者们尝试使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技术,同时考察多变量对集体行动参与的预测作用,使之数量模型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模型有 Van Zomeren 等人(2004)提出的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的双路径模型、Simon 等人(Simon et

al., 1998)提出并发展的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的双路径模型,以及 Van Zomeren 等人(2008)基于元分析得出的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

4.1 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的双路径模型

Van Zomeren 等人(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08, 2010)提出的集体行动参与模型包括一条工具理性和一条群体愤怒路径。工具理性路径包括群体效能和行动支持两个变量。行动支持指预期其他成员投入到集体行动中的意愿。群体愤怒路径中包括不公平感和社会观点支持两个变量。导致不公平结果的程序(程序不正义)要比结果本身更容易激怒人们。社会观点支持指预期其他成员一起分享不公平感的意愿。Van Zomeren 等人的模型显示,工具性支持感知(行动支持)可强化情绪支持感知(社会观点支持),但情绪支持感知并不必然增强工具性支持感知。换言之,行动支持感知和群体效能增强个体对群内其他成员分享其观点的期望,但情绪支持分享并不必然增强群体效能感。

Van Zomeren 等人认为,集体行动的理性路径属于问题聚焦应对方式,情绪路径属于情绪聚焦应对方式。这能解释为何 Olson (1965)提出的搭便车问题不再是棘手问题。Van Zomeren 等人(2004)指出,情绪聚焦应对方式可看作是一种通过参加集体行动来管理愤怒情绪体验的方式。一个人能在集体物品收益中搭便车,却不能在他自己的个人情绪调整中搭便车。参与集体行动本身就如同情绪阀作用一样,能达到平复个人愤怒情绪的效果,但这只有在个体亲历了行动之后才能起效。

4.2 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的双路径模型

Simon 和他的同事们(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et al., 2003; Stürmer & Simon, 2004, 2009)认识到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发展出同时包含计算和认同的双路径模型:计算路径由工具理性引导,集中于参与成本和收益计算;认同路径由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社会认同引导,该路径强调所属群体成员资格的认知、评价和情感重要性(Stürmer et al., 2003)。

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都能独立显著预测集体行动参与意向,参与集体行动不只是为了结果收益,更由于内群体成员间的认同感和紧密联系。而且社会认同还具备间接预测作用,能通过影响工具理性计算,使搭便车变得不那么吸引人。因为高

水平认同提高了背叛群体的成本与合作的收益(Klandermans, 2002)。

很多研究在探讨群体愤怒情绪时,都将其看作是不公平感知的结果,会激发出对抗性行动倾向,继而产生集体行动(Ellemers & Barreto, 2009; Van Zomeren & Spears, 2009)。Stürmer 和 Simon (2009)则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群体情绪只存在于行动因果链的早期阶段:在社会认同形成时起过作用,之后社会认同就成为了集体行动参与的直接就近动力。而且在 Stürmer 和 Simon 看来,愤怒情绪在群体成员中被普遍体验,不是变量而是常量,因此不会对集体行动产生预测作用。这也是为何他们的模型中不存在独立的群体情绪路径的原因。

4.3 基于元分析的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

社会认同研究发现,社会认同过程会影响理性计算过程(McCoy & Major, 2003),也会影响群体成员的情绪体验(Yzerbyt et al., 2003)。那么社会认同是否可同时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工具性和情绪性路径?如果可以,那是不是表明更合理的集体行动参与模型应该包含三条路径:社会认同、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

Van Zomeren 等人(2008)对 2007 年 6 月之前的集体行动研究中的 182 个独立样本结果进行元分析,提出整合的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SIMCA)。该模型中社会认同可直接预测集体行动,也可通过(群际)不公变量和(群体)效能变量间接影响集体行动。社会认同能作用于不公变量,是因为它提供了不公体验的群体分享基础,在情绪上激发个体参与集体行动(Smith, 1993; Van Zomeren et al., 2004)。社会认同能作用于效能变量,是因为较强的认同感能够向相对无力的个体灌能(empowerment)(Drury & Reicher, 2005)。因此,社会认同变量以调节变量的角色,在不公和效能两变量间起桥梁作用。以下是依据元分析后的变量间相关矩阵,做出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

SIMCA 肯定并证明了社会认同在集体行动前因变量中的中心地位,并确认不公和效能是集体行动的主要前因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弥补了以往模型较依赖某一特定行动类型的缺陷以及前因变量考虑不周的遗憾。但需要指出的是, SIMCA 亦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是效能概念的操作化标准。该元分析的对象只是工具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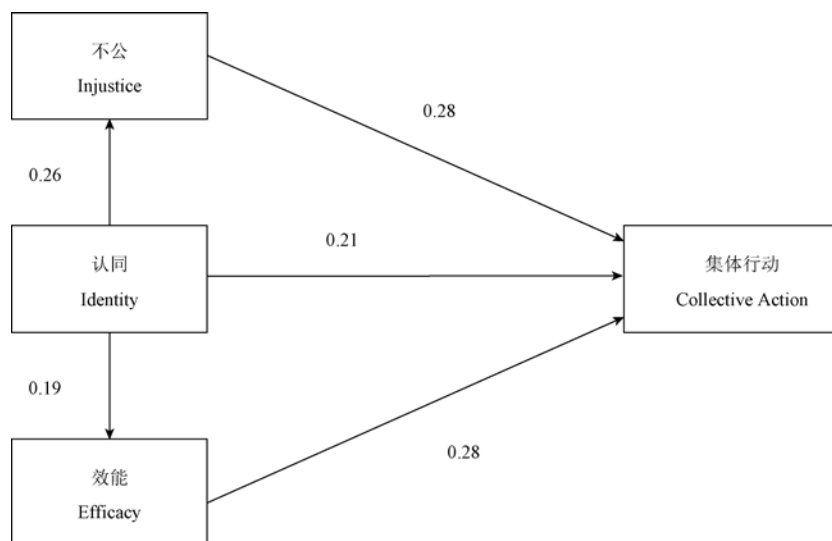


图1 整合的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SIMCA) (Van Zomeren et al., 2008, p. 521)

性中集体性动机的期望成分, 完全将工具理性中的社会性动机、奖赏动机排斥在元分析之外。它强调 SIMCA 中的变量必须是严格的群体水平变量, 比如群体效能、群际不公, 而社会性动机、奖赏动机属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变量, 因此不应包含在元分析中。这对之前大量的工具理性取向研究来说, 无疑会造成遗珠之憾。其次, 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 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主要因素很可能不限于该模型所包含的变量, 还有诸如理想信念(ideology)、身份确认等(Wright, 2009)。集体行动研究仍在发展, 相信会有更具解释力的模型诞生。

5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发展解释理论和建构模型上取得诸多重要成果, 但仍有很多现实而具体的集体行动现象无法被该领域既有研究成果充分解释, 这昭示着集体行动研究还需不断扩展和深化, 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5.1 行动情境类型与个体心理特征

迄今为止, 探讨何种情境下, 面对何种人, 哪一条集体行动路径会发挥主要作用的研究还很少。Van Stekelenburg 等人(2006, 2009)的工作代表着这一颇具潜力的新方向。他们认为, 人们参与某项集体行动的动机源于自我调节定向。自我调节可以是提升定向型(promotion-focused): 着重于发展的需求、理想目标和为进取性价值而努力奋

斗; 也可以是防御定向型(prevention-focused): 着重于安全的需求、义务和责任等应然目标, 以及遵循传统与顺从的价值(Higgins, 1998)。自我调节定向是个体特定目标、需求和价值的根源, 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世界的解释框架, 塑造集体行动者的参与动机。

Van Stekelenburg 等人(2006, 2009)发现, 以提升定向话语风格为动员特征的抗议行动, 会吸引更多的提升定向型个体; 反之, 以防御定向话语风格为动员特征的抗议行动, 会吸引更多的防御定向型个体。这就是 Higgins (1998)所说的调节匹配(regulatory fit)。

Van Zomeren 和 Spears (2009)借鉴社会功能主义视角, 对抱有不同动机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心理特征进行了比喻分类。第一类参与者被称作本能经济学家(intuitive economists), 他们参与行动是以主观效用最大化为终极诉求, 强调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重视群体效能信念。第二类被称为本能政客(intuitive politicians), 他们参与行动是以维护所属群体的正向认同为终极诉求, 强调对所属群体的责任承诺, 并自觉在公共领域中与外群体展开斗争(Simon & Klandermans, 2001)。第三类被称作本能理想家(intuitive theologians), 他们参与集体行动是以捍卫那些被世俗世界侵犯的神圣价值为终极诉求(Skitka, Bauman, & Sargis, 2005), 重视理想信念对其行为方向的指引作用。

Drury 和 Reicher (2009), McGarty 等人(2009)发现,群体内成员会随着与之互动的外群体对待他们方式的不同,不断变化、发展其社会认同的内容、方向和强度。这一发现刻画出了集体行动何以随情境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机制,对于突发性或突然升级的集体行动有很大解释力(Stott, Adang, Livingstone, & Schreiber, 2007)。

另外,个体心理特质与集体行动参与间的关系(Duncan & Stewart, 2007; Giguère & Lalonde, 2010)、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参与(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2009)、互联网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参与(Brunsting & Postmes, 2002)等新研究方向,未来都应该在行动情境类型和个体心理特征的分析框架下予以更多关注。

5.2 其它群体情绪类型的作用

除了愤怒或仇恨等群体情绪,未来研究还应考察更广泛的情绪类型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Smith, Cronin 和 Kessler (2008)发现,如果知觉到所属群体正遭受不公,并相信情况会越变越糟时,随之产生的伤心、恐惧等情绪会让人退缩,阻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不过也有研究表明恐惧情绪会促进集体行动参与倾向(Van Zomeren et al., 2010)。最近,研究者开始考察同情、内疚等群体情绪如何推动个体参与集体行动(Iyer & Ryan, 2009)。还有,Drury 和 Reicher (2009)对灌能的讨论向我们提供了集体行动中正向情绪产生作用的例子。除此之外,个体渴望获得对外群体复仇成功之后的喜悦感,参与集体行动带给个体的恐惧、焦虑体验之后的刺激和开心感(如同观看恐怖片),以及参与集体行动能给参与者带来改变未来的正向希望等等,这些都应该成为未来集体行动情绪研究的关注点。

5.3 潜在的新前因变量

除了已被确认的工具理性、社会认同、群体愤怒情绪三大前因变量之外,还有一些变量也可能推动了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明确这些变量的作用和地位。

(1)理想信念:Klandermans (2003, 2004)在讨论参与社会运动的基本动机时,认为除了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之外*,还有理想信念。Van

Stekelenburg 等人(2006, 2009)的实证研究已初步证明理想信念对集体行动有推动作用。(2)群体成员身份确认:有时发起、参与集体行动,只是群体成员用以确认、展示、证明成员资格是有价值身份的一种手段(Drury & Reicher, 2005),即使这些行动对群体地位、资源和现实没有实质性影响(Drury & Reicher, 2009; Louis, 2009; Simon, Trötschel, & Dähne, 2008)。(3)心理应对:与确认群体成员身份相似,一些集体行动的发起可能主要是弱势群体成员面对由群际不平等、压迫而产生心理压力的一种应对方式(Outten, Schmitt, Garcia, & Branscombe, 2009)。(4)影响他人:一些人发起、参与集体行动可能只是想鼓舞群内其他成员,抑或是唤起更多同类型群体的成员们、大众第三方的意识觉醒(Klein, Spears, & Reicher, 2007)。

5.4 与社会心理学其它领域的联系

以往的集体行动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有限的、特定类型的群际行动,这可能限制了集体行动研究与社会心理学其它研究领域间的联系与交流。

(1)群际关系领域:群际关系研究旨在探讨群际偏见的本质、原因和后果。在该领域学者眼中,减轻个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是减少群际不平等、增进社会公正的一种可能路径。但群际关系研究的因变量大多是情感、态度、对不平等境遇的感知,而非行为,更未考虑整个行为反应序列。集体行动研究则聚焦于社会抗议等集体行动如何成为提高弱势群体社会地位和境遇的一种方式。虽然它们都关注群际不公,但两大研究领域却一直在各自发展(Wright & Lubensky, 2009)。相信彼此间加强联系和交流,必将给双方未来的研究带来无限启发。

(2)歧视动机领域:Postmes 和 Smith (2009)指出集体行动与更广泛的歧视动机领域存在联系。群际歧视背后有动机推动,优势群体成员会发动、参与和弱势群体之间仪式性互动的集体行动,用以维持既有群际地位(McGarty et al., 2009)。传统的集体行动研究几乎从未注意到优势群体的内群体服务型集体行动,歧视动机研究领域则几乎都是关于优势群体的(Talaska, Fiske, & Chaiken, 2008)。虽然优势群体集体行动和弱势群体集体行动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后者仍能从歧视

* 2004年时群体愤怒路径才出现在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文献中。

动机研究中获得诸多启发(Postmes & Smith, 2009)。

社会心理学致力于探索社会中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动,以及他人对这些过程的影响。而一个人为何会投身到集体行动中去,这一问题直接指涉社会个体分析层面,因而进入社会心理学领域。它天然拥有丰富学术资源,必然可以向整个集体行动研究界不断提供养分。

参考文献

- 董国礼. (2007). 作为经济社会学议题的集体行动: 从奥尔森到科尔曼.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2), 1-8.
- 林闽钢. (2004). 危机事件与集体行动逻辑. *江海学刊*, (1), 94-96.
- 刘能. (2009).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集体行动: 对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的一个回顾. *学海*, (4), 146-152.
- 王赐江. (2010). 基于不满宣泄的集群行为.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 王国勤. (2007). 当前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 *学术界(双月刊)*, (5), 264-273.
- 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2009).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 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6(4), 69-77.
- 赵鼎新. (2006a).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赵鼎新. (2006b).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研究*, (1), 1-21.
- 周晓虹. (1994). 集群行为: 理性与非理性之辨. *社会学研究*, (5), 53-56.
- Blumer, H. (1951). Collective behavior. In A. M. Lee (Ed.),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p. 166-222). New York: Barnes & Noble.
- Brunsting, S., & Postmes, T. (2002).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redicting offline and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Small Group Research*, 33, 525-554.
- De Weerd, M., & Klandermans, B. (1999).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Farmers' protest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1073-1095.
- Drury, J., & Reicher, S. (2005). Explaining enduring empower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 35-58.
- Drury, J., & Reicher, S. (2009).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s a model of social change: Researching crowds and powe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707-725.
- Duncan, L. E., & Stewart, A. J. (2007). Personal political salience: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8, 143-164.
- Ellemers, N., & Barreto, M. (2009). Collective action in modern times: How modern expressions of prejudice prevent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749-768.
- Feather, N. T., & Newton, J. W. (1982). Values, expectations, and the prediction of social action: An expectancy-valence analysi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6, 217-244.
- Giguère, B., & Lalonde, R. N. (2010). Why do students strike? Direct and indirect determina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1, 227-247.
- Goodwin, J., Jasper, J. M., & Polletta, F. (2001).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ggins, E. T. (1998).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al principle.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1-4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Iyer, A., & Ryan, M. K. (2009). Why do men and women challenge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The role of group status and in-group identification in predicting pathways to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791-814.
- Jasper, J. M.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sper, J. M.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85-303.
- Kelly, C., & Breinlinger, S. (199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Kelly, C., & Kelly, J. (1994). Who gets involved in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trade unions. *Human Relations*, 47, 63-88.
- Klandermans, B.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83-600.
- Klandermans, B. (2002). How group identification help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 887-900.
- Klandermans, B. (2003).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 In D. O. Sears, L. Huddy, & R.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670-7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landermans, B. (2004).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In D. A. Snow, S. A. Soule, & H. Kriesi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pp. 360-379).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Klandermans, B., & Oegema, D. (1987). 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19-531.
- Klein, O., Spears, R., & Reicher, S. (2007). Social identity performance: Extending the strategic side of SID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 28-45.
- Koopmans, R., & Statham, P. (1999). Political claims analysis: Integrating protest even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 approache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4, 203–221.
- Le Bon, G. (1896).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Ernest Benn Ltd.
- Louis, W. R. (2009). Collective action—and then wha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727–748.
- McAdam, D.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 McCoy, S. K., & Major, B. (2003). Group identification moderate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erceived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1005–1017.
- McGarty, C., Bliuc, A.-M., Thomas, E. F., & Bongiorno, R. (2009). Collective action as the material expression of opinion-based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839–857.
- Miller, D. L. (2000). *Introduction to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Collective Action* (2nd ed.). Springfield, IL: Waveland Press.
- Mummendey, A., Kessler, T., Klink, A., & Mielke, R. (1999).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redictions b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229–245.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utten, H. R., Schmitt, M. T., Garcia, D. M., & Branscombe, N. R. (2009). Coping options: Missing links between minority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8, 146–170.
- Park, R. E., & Burgess, E. W.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stmes, T., & Smith, L. G. E. (2009). Why do the privileged resort to oppression? A look at some intra-group facto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769–790.
- 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ger, C. R., Smith, E. R., Kinias, Z., & Mackie, D. M. (2009). Knowing how they feel: Perceiving emotions felt by out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80–89.
- Simon, B., & Klandermans, B. (2001). 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19–331.
- Simon, B., Loewy, M., Stürmer, S., Weber, U., Freytag, P., Habig, C., et al. (1998).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646–658.
- Simon, B., Trötschel, R., & Dähne, D. (2008). Identity affirm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suppor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935–946.
- Skitka, L. J., Bauman, C.W., & Sargis, E. G. (2005). Moral conviction: Another contributor to attitude strength or something mo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895–917.
- Smelser, N. J. (1963).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 Smith, E. R. (1993).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s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rejudice. In D. M. Mackie & 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pp. 297–31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Smith, E. R., Seger, C. R., & Mackie, D. M. (2007). 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 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431–446.
- Smith, H. J., Cronin, T., & Kessler, T. (2008). Anger, fear or sadness: Faculty member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collective pay disadvantage. *Political Psychology*, 29, 221–246.
- Smith, H. J., & Ortiz, D. J. (2002). Is it just me? Th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of personal and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I. Walker & H. J. Smith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pp. 91–1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tt, C., Adang, O., Livingstone, A., & Schreiber, M. (2007). Variability in the collective behaviour of England fans at Euro2004: 'Hooliganism', public order policing and soci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 75–100.
- Stouffer, S. A., Suchman, E. A., DeVinney, L. C., Star, S. A., & Williams, R. M., Jr.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1.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4). Collective action: Towards a dual-pathway model. In W. Stroebe, & M. Hewstone (Ed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5 (pp. 59–99).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9). Pathways to collective protest: Calculation, identification, or emo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group-based anger i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681–705.
- Stürmer, S., Simon, B., Loewy, M., & Jörger, H. (2003).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fat acceptance movemen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6, 71–82.
- Tajfel, H. (Ed.). (1982).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8).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Talaska, C. A., Fiske, S. T., & Chaiken, S. (2008). Legitimiz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Emotions, not beliefs,

- best predict discrimination in a meta-analysi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1, 263–296.
-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 Wetherell, M. S.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New York: Blackwell.
- Turner, R. H., & Killian, L. M. (1957).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Van Aelst, P., & Walgrave, S. (2001). Who is that (wo)man in the street? From the normalization of protest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rotester.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9, 461–486.
- Van Stekelenburg, J. (2006). *Promoting or preventing social change: Instrumentality, identity, ideology and group-based anger as motives of protest particip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ree University.
- Van Stekelenburg, J., Klandermans, B., & Van Dijk, W. W. (2009). Context matters: Explaining how and why mobilizing context influences motivational dynamic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815–838.
- Van Zomeren, M., & Iyer, A. (2009).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645–660.
-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04–535.
- Van Zomeren, M., & Spears, R. (2009). Metaphors of protest: A classification of motiv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661–679.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49–664.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08).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action: Does relev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fluence how people cope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 353–372.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10).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dual pathway model analysis of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ri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339–346.
- Wright, S. C. (2009).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859–879.
- Wright, S. C., & Lubensky, M. (2009).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equality: Collective action versus prejudice reduction. In S. Demoulin, J. P. Leyens, & J. F. Dovidio (Eds.), *Intergroup Misunderstandings: Impact of Divergent Social Realities* (pp. 291–310).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 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994–1003.
- Yzerbyt, V., Dumont, M., Wigboldus, D., & Gordijn, E. (2003).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533–549.

Instrumentality, 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based Anger: Overview of Collective Action Research

CHEN Hao; XUE Ting; YUE Guo-An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Collective action has been concerned by the social scientific community for a long perio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ollective action research was mainly conducted from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but then was shifted to be led by the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Fortunately,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for collective action have come back to life and flourished by degrees in the past over 20 years. Instrumentality, 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based anger as the fundamental antecede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social psychologists so far. Moreover, two famous dual-pathway models of collective action were established separately, one of which included the instrumentality and group-based anger paths, the other of which included the instrumentality and social identity paths. And then based on a meta-analysis, an integrated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was propose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research should think highly of the context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d on collective ac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group-based emotions other than anger, broad the array of antecedents, such as ideology, and connect to other literatures of social psychology.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instrumentality; social identity; group-based anger; inter-group emotion